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时代意义、思想溯源与理论内涵^{*}

蒙剑 蔡翼飞 韩笑 程杰

摘要：人文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统筹经济与社会、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性运用“两个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命题。本文从时代意义、思想溯源、理论内涵与研究展望四个层面，系统分析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定位与逻辑架构。本文认为，人文经济学将人界定为追求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面人”，并把人文价值嵌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生产环节以社会伦理规范塑造主体偏好与预期、以创新文化推动技术进步、以文化创意转化新产品和新价值；分配环节以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确立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交换环节以社会资本、市场规制与行业伦理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秩序；消费环节以偏好塑造、消费规制与消费公平引导真实需求、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这一理论超越了资本中心与工具理性逻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局限，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内涵，体现了经济学向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回归，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了新方向。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 自主知识体系 两个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言

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①在人类现代化进程深刻调整、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亟须超越单一增长尺度，以人的全面发展重新审视发展目标、

* 蒙剑、蔡翼飞、韩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06，电子邮箱：caiyl@cass.org.cn；程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邮政编码：100732，电子邮箱：chengjie@cass.org.cn。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办项目“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影响研究”（2026YZDJ005）。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深入研究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样本》，《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0日。

发展方式和评价标准。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它既不同于主要研究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运行的文化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机械拼接,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源,运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对人文价值如何进入经济运行作出的系统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和研究方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经济发展领域贯通融合的学理表达。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已有文献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解大体可归纳为四类:一是文明形态论,强调其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为价值指向(逢锦聚,2024);二是融合互动论,关注“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双向作用(张二震和戴翔,2025);三是价值回归论,强调从资本增值和单一效用尺度转向人民福祉与人的尊严(任平,2025);四是要素赋能论,关注文化资源、人文要素与科技、城市、乡村等领域结合产生的增值效应(徐一超和单世联,2026;顾江,2024)。这些研究在以人民为中心、重视文化与经济互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需要进一步区分的是,人文经济是人文价值进入经济运行所形成的实践形态,人文经济学则是对这一实践及其规律的理论概括和学理表达,二者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能混用。

在这些共识下,围绕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仍存在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分歧。一是关于学科归属的“范式与分支之争”。“范式派”学者认为人文经济学具有颠覆性,应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而“学科派”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其构建为一门与传统经济学并列的、具有独立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交叉学科(韩喜平和杨羽川,2024)。二是关于动力机制的“文化”与“人本”之辩。前者认为文化作为先在的力量,通过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影响经济活动(陆扬,2013);而后者强调人作为能动的实践主体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创造文化,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反作用于经济活动(张二震和戴翔,2025)。三是关于与技术关系的“强化与异化之争”。技术乐观派肯定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对人文经济的促进作用,认为其能拓宽应用场景、催生新业态;而技术审慎派则认为科技可能导致文化空心化,算法对个体偏好和认知的规训可能导致新型的人文异化,人文经济最终沦为空洞的眼球经济(张苏缘和顾江,2025)。

在充分肯定已有研究成果贡献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正处于充满活力的初创期,还存在一些研究短板和局限。一是理论定位尚不清晰。已有文献未能明确人文经济学在经济学学术理论大厦中的位置。这一缺失导致人文经济理论构建的必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证明。其与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尚待进一步阐明。二是宏观与微观存在断裂。已有文献悬浮于顶层设计与现实探索之间,未能有效打通从宏观理念到微观实践的传导路径。如何将宏大的人文理念转化为政策设计、企业

经营、社区治理、个人选择等具体行为,是当前较为薄弱的环节。三是量化体系缺失。目前,幸福感、审美体验、文化认同等人文经济的核心产出难以被纳入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体系,其价值难以被“看见”和“度量”,不同地区和项目之间缺乏可比性,制约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政策效果的评估。四是国际比较研究相对薄弱。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中国本土经验,缺乏与全球范围内人文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度比较(戴俊骋和皮福玲,2025)。

针对上述研究缺口,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作出边际推进:一是明确理论定位,系统厘清人文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边界与关系,确立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坐标;二是打通宏微观传导机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框架下,明确人文价值影响经济行为的具体中介变量和作用路径,避免宏观理念与微观实践的断裂;三是提出构建量化评估维度的初步构想,为人文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提供基础框架,进而为创建量化体系提供可能;四是深化中西比较,既梳理中西人文经济思想的源流,也明确不同文明传统下人文经济发展的逻辑差异。本文的核心目标,正是围绕上述方向,推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人文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是对新时代中国发展深层需求的理论回应,也是丰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其现实意义在于弥补单一增长和效率尺度的不足,把人民需求、技术伦理、生态边界和文明多样性纳入经济发展的解释与评价框架,从而回应发展阶段跃迁、科技革命冲击、生态文明建设、西方固有认知局限以及中国经验的国际阐释等重大时代课题。这五个方面的回应又可归为两类动因:前三点着眼于破解发展实践中的现实挑战,后两点着眼于回应理论建构与国际传播的深层需求。

第一,回应发展阶段跃迁与人民需求升级的时代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取向从侧重规模扩张、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向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有机统一,推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已积累起坚实的物质基础,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物质的丰裕必然催生对更高精神文化生活与更美好人文环境的向往。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既需要持续夯实经济基础,更亟须明确的价值引领与人文精神灌注,从而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二,回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对人的发展造成的现实冲击。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重塑劳动形态、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效率,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同时,也带来技术红利向资本、平台和少数高技能群体集中的倾向,普通劳动者面临岗位替代、技能贬值、收入分化和劳动过程被算法支

配等风险,人的创造性、主体性和存在意义面临深刻挑战。若任由资本不受约束地主导发展,科技进步就可能偏离人的福祉,甚至消解人类存在的价值,使社会陷入效率提升与意义失落并存的深层困境。面对这一现实冲击,单纯以增长速度、技术效率和资本回报衡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已显不足(刘方喜,2024)。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福祉为根本尺度,推动科技进步从服务资本增值和效率竞争转向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共同福祉和文明进步,通过人文精神以及制度安排为技术应用确立价值边界。

第三,回应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关系重塑的重大挑战。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技术选择问题,更是发展理念和价值秩序问题。中国人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则进一步把中华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发展原则和治理实践。人文经济学正是这一理念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呈现,将生态文明思想深度内嵌于经济学理论框架,以生态伦理重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统一。

第四,回应突破西方经济学固有认知框架局限的深层需求。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偏重可量化、可模型化的最大化目标,习惯于从市场均衡和效率提升出发,把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简化为相对清晰的线性因果关系。这种分析方式在解释价格机制、资源配置和市场行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也容易遮蔽经济运行背后更深层因素的影响,尤其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这样具有鲜明文明底色和制度特征的发展实践,无法阐明文化价值、社会信任、共同体意识和治理能力对经济发展的深层影响。突破西方经济学认知框架的局限,在更开阔的理论视野中重新理解经济规律,对当下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人文经济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思维方式,将经济运行置于多元化的社会有机整体中来理解,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经济规律,进而构建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的经济学理论。

第五,回应传播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诉求。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中西方文明的比较,多以西方经验与价值观为中心展开叙事,形成了一套以资本逻辑和西式民主制度为核心的解释框架。然而,这一框架既无力揭示多元文明对发展道路的塑造作用,更无法真正解码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历史、文化与制度逻辑(任平,2025)。国家经济影响力的拓展,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影响力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需要一套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人文表达,以消除隔阂、降低理解壁垒。因此,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现代经济理念,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既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局限的必然选择,更是赋予中国经济实践以文化亲和力与说服力、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并接纳中国发展逻辑的重要路径。

三、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溯源

古今中外,东西方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围绕精神与物质、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探索,积淀了浩如烟海的理论成果与思想遗产。这些思想资源是人文经济学的文化根脉,为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滋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经济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和天人合一的基本取向,富国与富民、物质生活与道义秩序如何协调是千百年来不断探究的问题。

先秦时期,人文思想在百家争鸣中萌芽。诸子百家围绕富国富民展开论辩,“民惟邦本”“敬天保民”成为重要理念,经济发展指向养育人民、实现安康。管仲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仓廩实而知礼节”揭示了物质条件对精神文明的基础作用。儒家将经济活动纳入伦理框架加以审视,孔子的“见利思义”思想、孟子的“制民之产”主张、荀子的“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理念,都认为追求道义与满足物质需求是人性中兼有的两个方面,并试图将经济分配同民生与道德相统一(周建波,2026)。

秦汉以后,民本与义利观逐步转化为治理和市场制度。汉初“与民休息”、司马迁“善因论”强调顺应民间求富动力;盐铁之议对富国与富民边界的讨论、“常平仓”以丰年收购和荒年售出稳定粮价,则体现了国家干预须以保障民生为尺度(周建波,2026)。唐宋商品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农商并重和义利兼顾,李觏“人非利不生”承认合理求利的正当性,王安石以“理财乃所谓义”兼顾公共目标与经济效益,叶适等人为工商业和富民的正当性辩护(叶坦,1991;周建波,2026)。综上,秦汉正是在富民与强国之间的反复博弈中逐步实现了文化与经济制度的融合统一,唐宋从学理上承认了工商业的正当性,义利兼顾的理念协调了经济效益与道义原则的关系,为人文经济学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供了参照。

明清以来,“工商皆本”“理欲统一”等主张进一步承认多元生产方式和合理需求,为协调产业发展、规范消费欲望提供了思想资源。近代面对西方冲击,魏源、郑观应等人对富强的探索把技术、工商业与国家能力联系起来,孙中山先生则以“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推动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叶世昌,1998)。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反传统与创造性转化两种取向交互作用,一方面打破“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等旧有束缚,另一方面也促使梁漱溟、冯友兰等思想家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合一与民生关怀(陈来,2006),推动科学、民主与义利秩序关系的重构。这条脉络既承认现代市场、技术和资本的生产力作用,也要求防止少数利益支配公共生活,使工业化和现代化成果能够由人民共享。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文经济学提供的是以民为本、义利相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结构,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理论创造的重要根基。经过创造性转化,这一结构可以嵌入产权与交易规则、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产

业发展和消费引导,使经济增长同时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发展能力、社会关系与精神生活,并以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财富数量本身检验发展成效。

(二)西方思想史中的人文经济思想

西方思想围绕人、财富、市场与伦理形成了另一条复杂脉络。这一脉络反映的并非从伦理束缚走向经济自由的单线进步,而是经济自主与社会规制反复调整的历史过程。其理论价值在于揭示效率机制、权利保护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张力,并为人文价值如何借助法律、政策和社会规范进入现代经济制度提供可资对话的资源。其中始终存在两条相互拉扯的线索:一条强调市场自主、契约自由、个人选择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现代经济学形成了较强的分析工具;另一条则不断提醒市场并非自足体系,经济运行必须面对贫困、不平等、社会团结、生态边界和人的能力发展等问题。

古典思想把经济活动置于人的需要和正义秩序之下。亚里士多德区分满足生活需要的自然经济与追求货币无限增值的致富术,警惕财富从手段变为目的(赫婧如,2024);罗马法则以财产权、契约和交换规则稳定经济秩序,使主体权利获得制度表达(何勤华和金逸菲,2025)。中世纪的“公平价格”和反高利贷主张虽带有宗教色彩,却强调交易不得脱离道德责任和共同体需要。两者共同表明,人文价值既要限定财富追求的目的,也要塑造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产权、价格和契约只有以真实需要、公平交换和人的尊严为边界,才不会异化为强者支配弱者的工具。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提升了劳动、节俭、理性与个人自主的地位,为市场扩展提供文化正当性,也推动经济活动从身份等级和宗教权威中相对独立(梁鹤年,2014)。亚当·斯密以市场机制解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联结,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同情、正义和伦理约束。这说明,市场能够通过价格和竞争把分散选择转化为社会协作,但其有效运行依赖诚实信用、法治、公正竞争和对他人处境的关切;忽略这些社会文化条件,“看不见的手”便容易被简化为市场自足的教条,个体自由也可能被压缩为单一的逐利自由。

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学日益以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和增长效率为中心,人的劳动处境、社会关系、伦理责任与精神需要被压缩,资本增值也更容易被等同于社会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公共投资曾通过就业政策、再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试图修补这一缺失,使发展重新具有公共性;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推动金融化、私有化和去监管化,导致资本逻辑进一步渗入教育、医疗和文化领域(桑明旭,2025;陈兆旺,2025)。这种反复表明,人文价值不能只依赖危机后的政策补偿,而须稳定嵌入市场准入、劳动保护、财富分配和公共服务制度,否则经济增长仍可能以牺牲人的安全、平等和发展机会为代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平等、气候变化、平台垄断和人工智能伦理等问题推动西方理论重新审视增长目标与人的主体地位。能力方法以人的实质自由而

非收入单一指标评价发展,行为经济学修正完全理性的主体假设,生态经济学强调自然边界,财富分配研究则重启公平与权力结构议题(森,1992)。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在不同层面对主流范式作出修正,提示人文经济学不能停留在价值宣示上,而应进一步转化为可分析、可比较、可检验的机制框架。

西方传统在个人自由、产权契约、市场协调、法治规范和现代政策工具方面具有重要贡献,也暴露出经济与伦理分离、形式自由掩盖实质不平等以及资本逻辑扩张的局限。这也决定了中国人文经济学既要充分认识并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个人理性和市场机制等方面的合理成分,也要冷静分析其在资本中心逻辑和抽象个人主义假设中的局限。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人文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说明制度、政治和文化观念并非经济运行之外的附属因素,而是会通过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和主体意识反作用于生产关系、主体行为和资源配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表明,在资本逻辑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经济关系会经由制度和观念形态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使人面临沦为资本增值工具的风险,进而引发了深刻的人文危机。人文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价值依托,其上层建筑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服务于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人文经济学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根本精神,更在新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发展中鲜明的人民立场与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深刻批判,核心在于对“异化劳动”本质的揭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愈多,自身却愈陷于贫困;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反过来支配劳动者本身。^①人本应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却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李向民,2025)。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拜物教”现象,剖析商品、货币、资本如何成为支配人的物化力量,指出商品形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扭曲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由此丧失了对自身创造物的自觉掌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核心理想,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这否定了将人视为纯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经济活动应服务于人的解放与整体性成长,体现了人文经济学的根本主张(张二震和戴翔,2025)。

(四)新时代的人文经济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探索经济与人文的关系,先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赵昌文,2022)。习近平总书记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经验与未来趋势,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与人文经济相关的思想较早出现于《之江新语》关于“文化经济”的相关论述中。“文化经济”的本质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互动、融合发展,即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统一,文化产品应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做到“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①文化不仅被视作提升经济发展人文价值与组织效能的关键,更被定义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②这些论述明确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方向,强调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③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文化开始更深层次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推动消费升级、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各地通过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体育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引导经济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转型。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概念,并倡导研究其中蕴含的学理。同年考察江苏时,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④彰显了人文传承与高质量发展相融合的新范式。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⑤人文经济学不仅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被提出,更在实践中被赋予了系统的理论内涵与明确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的论述以人民立场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其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从早期强调文化与经济融合互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到新时代强调以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进而提出研究“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这些论述构成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和根本遵循,也为其处理文化、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实践依据。

四、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一)基本定义

要准确把握人文经济学的内涵,关键在于厘清“人文”与“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各自的意蕴与边界。首先应明确“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这是把握人文经济学内涵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这决定了

^{①②③}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49、34页。

^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7月8日。

^⑤《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人民日报》2025年3月6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与主体。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发展的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②研究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不能仅限于生产关系本身,而要延伸到影响生产关系的各种因素。其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一个核心研究领域。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在观念上层建筑中,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思想集中体现了其中关于人的价值、意义和发展目标的核心关切(胡洪彬,2025)。因此,考察人文思想如何经由制度规范、政策安排和主体行为影响经济运行,构成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关系的重要维度,也内在地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拓展的研究视野。

其次应明确“人文”的内涵与外延,这是理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人文”这一概念并非舶来品,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原生概念。“人文”一词较早出自《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③这里的“天文”指自然运行的规律,“人文”则指人类社会的文明教化与运行法则,集中体现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中华文明最鲜明的标识,其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与能动性。^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重视人民主体地位、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契合点,但二者的思想语境和理论形态并不相同,需要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

为更好地理解“人文”的概念,还需要区分其与“文化”概念的差异。文化与人文是“形”与“魂”、载体与内核的关系。人文回答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价值问题,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则是人文的具体形态与现实载体,表现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制度及其物质成果,是人文精神在历史实践中对象化、凝结化的产物。一方面,人文因文化而得以表达、传承与传播。离开一定的文化形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便只能停留于抽象宣示,无法进入制度安排、行为规范与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文化因人文而获得方向和尺度。并非一切文化成果都天然具有正当性,唯有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归宿、能够切实改善人的生存条件、社会关系、发展能力与精神生活的文化,才是人文经济学意义上的积极力量。

从人的存在方式看,人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终置身于三重基本关系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华文化对关系的理解,贯穿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辩证思维,以和谐为关系的理想形态。以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7页。

②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③杨天才和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国书店2021年版,第207页。

④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页。

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之中,分别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和谐有序、自我修养和完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强调人既是自然的利用者,也是自然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真正符合人自身长远利益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的整体福祉之中,追求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状态。

在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的伦理秩序,主张以“仁爱”“礼义”“诚信”的理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不能只讲效率和竞争,还要重视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和人的尊严,让发展成果更多体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改善、社会凝聚力的增强和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身心合一”的修养观,构成了中国“为己之学”的核心内涵(张立文和胡兆东,2024)。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在物质追求之外,必须将修养提升、人格完善和精神充实作为人存在的目的,实现欲望与理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外在成就与内在安宁之间的平衡。

在三重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人文经济学分析的主体是“全面人”,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落实于人的具体存在方式之中。前文所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和谐统一,正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存在论层面的展开形式。同时,这也为后文分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提供了价值坐标。西方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经济人”是对行为动机的必要简化,有助于形成可推演的理论模型,但难以完整呈现人在家庭、社群、文化传统和自然关系中的嵌入性,也无法容纳利他、责任、认同和意义追求等稳定存在的行为动机。“全面人”假设包括三个要点:其一,在动机结构上,“全面人”假设并非否认利益动机和理性选择,而是将利他、责任、认同、意义追求及有限理性等纳入分析,考察多重动机在不同制度和文化条件下如何共同影响决策;其二,在关系维度上,“全面人”始终置身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之中,以三重关系的和谐统一而非单一维度的最大化为行为取向;其三,在行为条件上,“全面人”的选择受制度规范、文化观念和社会信任的持续塑造,并通过自身实践反作用于这些结构。

通过以上对人文与经济学的概念的分析,本文对人文经济学给出如下定义:人文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统筹经济与社会、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从概念边界看,人文经济是人文价值嵌入经济运行所形成的实践形态,人文经济学则是对这一实践的基本规律、作用机制和实现条件的理论概括,二者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从学科边界看,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和研究方向,具有形成相对独立学科形态的可能,相关核心范畴和基本

命题尚待凝练,方法体系尚待完善,经验研究尚待积累。从理论坐标看,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人民性与文明性价值意蕴在人文—经济关系上的学理化展开,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经济发展领域贯通融合的重要理论表达。

(二)逻辑架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这一基本框架内,人文经济学关注人文价值如何经由制度规范、偏好塑造、社会信任、创新激励等中介变量影响主体行为和制度选择,并进一步作用于发展绩效与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以形成“人文价值—中介机制—行为模式—经济绩效—人的发展”的基本解释链条。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人文价值嵌入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相互关联环节。

在生产环节,人文经济学主要从劳动主体地位、生产关系和生态边界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生产既是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技术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关系不断生成和调整的社会过程。人文价值主要通过三类机制发挥作用:其一,社会伦理观念与个人修养的要求规范塑造主体偏好和行为预期,诚信、守约等价值有助于积累社会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其二,创新文化通过塑造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意愿、推动实用知识积累与传播、形成宽容创新与多元思想的社会氛围,并在文化企业家引导和思想市场竞争中改善创新激励,进而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经济发展;其三,历史文化、创意内容和审美资源可以转化为差异化产品、品牌价值和新型业态。

在分配环节,人文经济学以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尺度,考察经济成果的形成与归属。分配是嵌入产权结构、要素定价、劳动关系、财政税收和公共服务之中的制度安排。人文价值主要通过两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是初次分配,通过完善工资形成、劳动者参与和各类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保障劳动报酬和创新收益的合理实现;二是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特别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公益慈善等方式调节收入差距、增强基本保障,以及通过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教育、医疗、养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缩小不同群体实际发展机会的差异。其目标是在激励创造的同时防止要素收益和发展机会过度失衡。

在交换环节,人文经济学关注诚信、互惠和权利平等如何塑造市场秩序。价格机制和产权规则是交换运行的基础,但交易的持续性还依赖契约精神、社会信任与公平竞争(史密斯和威尔逊,2019)。人文价值主要通过三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是社会资本,诚信守约的文化规范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契约监督和执行成本,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二是市场规制,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制度可以矫正市场势力和信息优势造成的不平等交换;三是行业伦理和主体自律,通过职业规范、声誉机制和社会责任约束逐利行为。由此,市场交换既保持效率和活力,也受到公平、诚信和公共利益的必要约束。

在消费环节,人文经济学考察需求如何形成以及消费如何影响人的发展、社会关系和生态环境。它不否定消费者选择和物质需求,而是反思消费主义、炫耀性消费和高耗能消费可能造成的主体异化、社会分化与生态外部性。人文价值主要通过三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是偏好塑造,教育、文化供给和公共传播能够丰富人的需求层次,引导健康、文化和绿色消费;二是消费规制,针对信息不对称、成瘾性产品和环境外部性,运用信息披露、消费者保护、税费政策及行业标准等工具校正市场失灵;三是消费公平,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文化供给和特殊群体权益保护,保障不同群体满足基本需要和参与文化生活的机会。此类引导应尊重个体自主和需求多样性,避免以统一价值偏好替代消费者选择。

上述四个环节是社会再生产中相互制约、循环反馈的整体。生产决定可供分配和交换的产品、就业与收益,分配影响有效需求、社会信任和人力资本积累,交换把需求变化与社会评价传递给生产者,消费借助需求结构和生活方式反向引导投资、创新与资源配置。人文价值通过规则、激励、信息和能力等机制改变主体选择,再经由各环节间传导产生整体效应。这一循环还表现为从微观行为向中观制度和宏观绩效递进,并由发展结果反向塑造主体行为。企业的用工、创新和责任选择,家庭的教育、消费与储蓄决策,社区的互助规范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共同影响效率、公平、文化繁荣与生态可持续。这些结果又通过影响收入、教育健康、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作用于人的发展。人的能力、信任水平和价值认同改善后,会进一步改变创新意愿、合作方式和制度需求。由此,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价值目标,也是可以通过主体行为、制度安排和发展绩效加以观察的结果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传导并不意味着强调人文价值就必然产生良好绩效。若缺乏清晰的权责边界、适当激励、法治保障和主体参与,人文精神的作用可能仅停留在宣传倡导层面,甚至增加交易成本或挤压个体选择。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识别不同制度条件下影响机制的方向、强度与代价,区分价值目标、政策工具和实际结果,避免把理论上的推论直接等同于必然事实结果。

(三)理论定位

1. 人文经济学是对西方新古典主流范式若干局限的批判与超越

首先需要说明,西方经济学内部存在多种理论传统。福利经济学关注分配与社会福利,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和交易成本,行为经济学修正完全理性假设,能力方法重视人的实质自由,生态经济学反思增长边界。这些理论都与人文经济学存在对话空间(见表1)。因此,本文的比较对象并非所有西方经济学,而是作为理想类型的新古典主流范式,即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为主要特征,以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评价标准的分析框架。所谓“资本中心主义倾向”,主要指这一范式在特定政策实践中容易把资本回报、市场效率和增长绩效置于优先位置,并非其全部理论的自我宣称。人文经济学的意义也不在于全盘否定,而在于吸收其分析工具的同时补充被简化的文化、伦理、关系和生态

维度。

在立场价值上,人文经济学明确以人民福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强调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的统一。新古典主流范式通常把个体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行为假设,把配置效率作为核心分析标准;这些设定具有解释和建模功能,并不必然等同于把增长或资本增值确立为终极价值。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人文经济学把发展目的和价值排序显性纳入理论框架,并以多维福祉校正单一效率尺度。

表1 人文经济学与西方新古典主流范式的比较

对比维度	人文经济学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结合	以边际分析、理性选择、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均衡理论为主要基础;西方经济学内部另有福利、制度、行为、生态等多元研究传统
立场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多维福祉为价值归宿,统筹效率、公平、文化和生态目标	通常把个体效用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行为假设,以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分析标准;价值目标需借助福利函数或公共政策另行设定
主体假设	“全面人”:承认利益动机,同时关注关系嵌入、文化认同、责任、意义追求和有限理性	“理性行动者”:在给定偏好与约束下进行优化选择,是便于推演的简化假设;行为经济学等对其有所修正
研究对象	研究人文价值、文化传统和伦理规范如何在制度条件下影响生产关系、经济行为和发展质量	主要研究稀缺约束下的选择、交换和资源配置;制度与文化可作为约束或解释变量,但在基础模型中常被简化
研究方法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规范与实证、历史与逻辑、案例与数量分析,并吸收适用的形式化工具	重视形式化建模、均衡分析、计量检验和因果识别,具有精确性优势,也可能简化历史文化情境
政策取向	以高质量发展和多维福祉为导向,统筹市场效率、分配公平、公共文化和生态可持续	强调价格机制、激励和效率;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进一步处理分配、外部性和公共服务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主体假设上,理性经济人是对行为动机的必要简化,有助于形成可推演的理论模型,但难以完整呈现人在家庭、社群、文化传统和自然关系中的嵌入性。人文经济学提出“全面人”视角,并非否认利益动机和理性选择,而是将伦理责任、文化认同、意义追寻、有限理性等非经济动因纳入分析,考察多重动机在具体制度和文化语境中的复杂互动如何共同影响决策。

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经济学不以规范判断取代事实分析,也不因强调价值而排斥形式化和实证检验。其方法论特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基础上,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历史研究与机制识别、案例比较与数量检验。“一般均

衡”等现代经济学工具仍可用于揭示经济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动态和谐共生秩序”则作为补充视角,用于考察经济系统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

在政策取向上,人文经济学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物质与精神等多维关系。人文经济学更强调全局平衡,不局限于事后的再分配补救,而是将公平与人的发展要求前置,并嵌入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全过程。通过协调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高质量发展和多维福祉为导向,统筹市场效率、分配公平、公共文化和生态可持续。

2. 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人民性与文明性价值意蕴的学理化展开

人文经济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两个结合”,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人民性价值内核进行系统化和学理化阐述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人民性与文明性价值意蕴在人文—经济关系上的重要理论表达。

第一,人文经济学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立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代内涵。它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异化逻辑的批判,把人民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文化基因相结合,拓展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分析边界,将人理解为兼具经济、社会、文化、伦理和生态属性的完整的人,并把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化为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宜居等多维目标(李向民,2025)。

第二,人文经济学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战略引领,强化了新时代发展理论的价值导向。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和路径等重大问题。人文经济学从目标导向和愿景导向出发,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系统化、学理化。革故鼎新、天人合一、协和万邦、民本大同等中华文化智慧,为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文化根基和价值动力,使其不仅成为经济政策的基本遵循,而且呈现出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明意蕴。

第三,人文经济学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核心命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它把人文精神、文化元素、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纳入经济发展解释框架,强调文化是影响发展目标、制度选择、产业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内在力量。通过研究文化价值向经济动能的转化机制,发展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文化+”融合业态,有助于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扩张与精神贫乏并存的难题。

第四,人文经济学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和时代使命,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文明表达。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理想的现代表达。人文经济学强调,应把正义原则和共享理念融入经济运行与制度设计,通过文化赋能和制度创新,使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社区资源和劳动创造更充分地参与价值分配,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五,人文经济学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现代化的重要指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维度。人文经济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辩证统一的思想,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相结合,并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实践指引,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人民福祉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推动绿色发展由政策要求转化为社会文化自觉。

五、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简单地在现有学科目录中增设一个分支,也不是以一种新范式取代全部既有经济学,而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核心范畴、基本命题、机制链条、方法体系、经验支撑和话语表达。现阶段,人文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和理论生长点。未来能否进一步发展为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取决于其能否形成稳定的研究对象、可推演的理论命题、可检验的经验研究和持续的学术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思想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的制度条件与经验基础,共同构成中国推进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独特优势。为此,需要在凝练核心思想、完善理论体系和强化话语体系三个方面持续推进。

(一)凝练核心思想: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内核

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凝练能够统摄全局的思想内核。“全面人”作为本文的主体假设和逻辑起点,其多重动机、关系嵌入和行为条件已在上文加以界定;但不能只停留在对“理性经济人”的否定上,未来研究还应进一步检验其分析后果、可推演性,并积累相应的经验证据。“全面人”假设的完善,要将个人决策的出发点从孤立个体拓展至家庭、社群与文化生态中的平衡,将企业重新界定为负有经济、社会与生态多重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组织,以此逐层完善微观主体、价值、交换与宏观经济理论。其次要揭示人文价值的作用机制,阐明人文精神和社会伦理如何经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影响经济行为、塑造制度选择、引导产业形态和约束主体行为。

(二)完善理论体系:搭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框架

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形成系统化、学理化、可验证的理论框架,避免理论悬浮于价值宣示。从学理建构看,应重点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一是从本体论维度,明确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体假设和立场价值。系统回答人文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以什么样的人为前提、以什么样的发展为归宿,进一步厘清其与

^①《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的边界与关系,确立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坐标。二是从认识论维度,建立分析框架,揭示传导机制。围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系统分析人文价值影响各环节经济行为的具体路径,构建“人文价值—中介机制—行为模式—经济绩效—人的发展”的完整解释链条,打通价值理念到微观主体行为、中观制度设计、宏观发展绩效的传导路径,使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具备可检验、可推演的理论结构。三是从方法论维度,形成多元方法体系,构建初步的量化评估框架。一方面,构建多元综合的研究方法体系,积极利用现代经济学在模型建构、指标设计和实证检验方面的成熟工具,同时引入历史研究、案例分析、比较研究和跨学科方法,实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初步考虑构建人文经济发展水平的四维评估框架:人的全面发展维度,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占比、预期寿命、居民主观幸福感等指标;人文与经济融合维度,包括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指数、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营商环境便利度等指标;生态可持续维度,包括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强度、居民绿色消费占比、PM2.5平均浓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指标;社会发展维度,包括劳动权益保障指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文化传承保护的财政投入占比等指标,为人文经济发展的政策评估和跨地区比较提供可操作的量化基础。四是从实践论维度,推动理论转化,畅通实践转化路径。认真总结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实践、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文化振兴、人文城市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苏州等文化发达地区实现人文与经济互促的典型经验,将其提炼为理论资源,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学术范畴,并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

(三)强化话语体系:形成自主和开放的学术表达

强化人文经济学话语体系,核心是形成既扎根中国实践、又能够进入国际学术对话的概念和命题,将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人”、义利统一、文化嵌入、和谐共生等理念转化为可定义、可比较、可检验的经济学语言。一是基于人文经济学阐明中国经济发展何以具有独特性。中国的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人民主体实践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发展道路。人文经济学应从文化、制度、价值和文明的结合上,阐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深层逻辑,讲清楚中国道路如何立足中国文化和制度、如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二是深化国际比较,在文明多样性中明确理论边界。不同文化传统可能形成不同的人文经济观念和实践形态,不能以单一文化模式衡量所有国家。国际比较既要客观评价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资源,也要比较欧洲福利国家、东亚发展型国家及其他地区处理文化、市场和社会政策关系的经验。比较的目的是识别共同问题、不同机制和适用条件,形成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三是处理好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技术伦理、分配正义、生态边界

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各国现代化普遍面对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两个结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则构成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具体理论来源。我们应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国际学术共同体能够理解和检验的命题,为其他国家提供可供比较的思想资源和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 阿马蒂亚·森,1992:《再论不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译本。
- 陈来,2006:《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兆旺,2025:《精英的经济政变: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的政治逻辑》,《比较政治学研究》第2期。
- 戴俊骋、皮福玲,2025:《国内外文化经济学研究进展与比较启示——基于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的文献分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弗农·史密斯、巴特·威尔逊,2019:《人的经济学:〈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启示》,中信出版社2024年中译本。
- 顾江,2024:《人文经济学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遵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4期。
- 韩喜平、杨羽川,2024:《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建构路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何勤华、金逸菲,2025:《罗马法复兴与英国民商法的成长》,《河北法学》第3期。
- 赫婧如,2024:《财富与幸福:论亚里士多德的财富观》,《理论界》第5期。
- 胡洪彬,2025:《从人文经济到人文经济学: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启示》,《经济学家》第12期。
- 李向民,2025:《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人文经济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3期。
- 梁鹤年,201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刘方喜,2024:《文化第三场革命与脑工劳动解放:人工智能机器生产工艺学批判》,《艺术学研究》第4期。
- 陆扬,2013:《论文化的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
- 逢锦聚,2024:《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光明日报》1月16日。
- 任平,2025:《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本质向度与规律性效应的再阐释》,《理论探讨》第5期。
- 桑明旭,2025:《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论纲》,《理论月刊》第8期。
- 徐一超、单世联,2026:《论数字时代人文经济的叙事之维》,《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
- 叶世昌,1998:《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叶坦,1991:《叶适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
- 张二震、戴翔,2025:《人文经济的创新性、超越性及其内在机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5期。
- 张立文、胡兆东,2024:《〈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学术界》第4期。
- 张苏缘、顾江,2025:《“赋能”与“负能”:人工智能对人文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学术论坛》第6期。
- 赵昌文,2022:《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中国经济评论》第8期。
- 周建波,2026:《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求是》第12期。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MENG Jian, CAI Yifei, HAN Xiao and CHENG Ji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Summary: Humanistic economics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development moves beyond a narrow focus on growth, efficiency, and capital returns, economic theory must respond more fully to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the need to explain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ly intelligible terms. Existing studies address civilizational form, cultural-economic integration, a renewed emphasis on values,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 However, its theoretical position, behavioral assump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evaluation remain insufficiently clarified.

Drawing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combines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mechanism-based analysis. It review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thought on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It defines humanistic economics as a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takes the people as its center, aims to promote well-rounded human development, coordinat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lances efficiency and equity, and advances the harmony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progress. Humanistic economy denotes the practical form in which humanistic values are embedded in economic operation; and humanistic economics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of this practice.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holistic economic actor as the basic behavioral assump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Unlike *homo economicus*, which models individuals as rational and self-interested economic actors, the holistic economic actor is motivated not only by self-interest and rational calculation but also by responsibility, identity,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pursuit of meaning,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cological concerns. Individuals are understood as embedded in three relationships: thos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others in society,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mselves. Well-rounded human development therefore entails material prosperity, spiritual enrichment,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rather than a one-dimensional increase in wealth or utility.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n explanatory chain linking humanistic values,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production, ethical norms, innovative culture,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hape labor relations, innovation incentives,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ecological boundaries. In distribution, primary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tertiary distribu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promote equ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exchange, social trust, market regulation,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safeguard fair competition. In consumption, preference forma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consumption equity encourage healthy, cultural, green, and sustainable patterns.

This framework retains useful analyses of markets and formal modeling while incorporating cultural, ethical, relational, and ecological dimensions that are often simplified in the neoclassical mainstream paradigm.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thus positioned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and research direction in adapt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China's conditions and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It offers a systematic academic elaboration of the people-centered and civilizational values embodied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Economy.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wo Combinations; Chinese Modern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B41, P16, Z10

(责任编辑:宏文)
(校对:朝东)